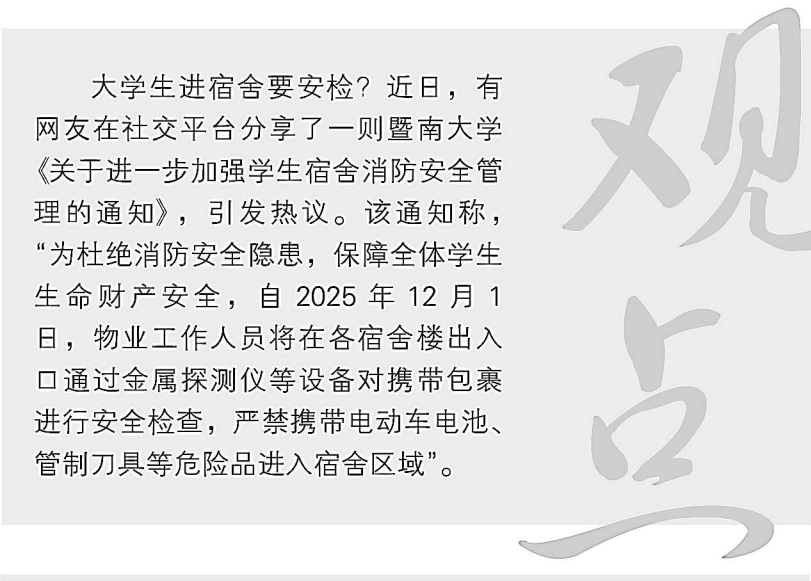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学宿舍设安检 要管理也要温度



进宿舍安检,有“过度管理”之嫌

学校加强学生宿舍消防安全管理的出发点没有错,但是,是否采取安检这一做法,首先要看是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。

安检的相关法规在不同的场景和行业中有所差异。一般来说,航空器、列车、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公共交通运输的安检都有相应的法规支持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主义法》第三十四条规定,大型活动承办单位以及重点目标的管理单位应当依照规定,对进入大型活动场所、机场、火车站、码头、城市轨道交通站、公路长途客运站、口岸等重点目标的人员、物品和交通工具进行安全检查。大学生宿舍楼这样的一般设施,显然不属于以上必须进行安检的场景范围。在缺乏相关法规授权支持的情况下,对学生进出宿舍楼进行安检,可能涉嫌“过度反应”,对学生的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

可探索其他管理手段,培养学生自主安全意识

站在“安全最大化”的角度,学校此举似乎也是情非得已。可是仔细推敲,还是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。高校宿舍管理当然要保障安全,问题在于怎么做综合效果最好。

就常理来说,将电动车电池带回宿舍充电是麻烦的。如果校园里有便利、安全的充电场所,学生完全没必要做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反过来说,如果把投入在安检上的资源,用于建设充电场所,从根本上解决学生充电的需求,或许也能有效避免将电池带回宿舍的情形。所以,学校为什么突然出台宿舍安检这样的举措,有没有穷尽其他管理手段,还是应该做出进一步说明。

安检应该是安全管理措施中“最后的办法”,其释放的就是“不信任”的信号,在校园这样的内部场景中,尤其应该谨慎使用。如果天天把学生群体当“坏人”防着,很容易制造管理者和学生的对立。

即便坚持安检措施,学校也应该做好沟通说服工作,比如组织召开有

对大学生宿舍进行安检,成本问题也不容忽视。在每个宿舍楼都配备金属探测仪等设备,需要多少费用?在每个宿舍楼出入口,都配备安检人员,需要多少人员?这些费用由谁来出?这是必须核算清楚的。

据报道,该校将长期执行这一政策,那么,安检费用就将是一项长期支出。这必然会挤占学校对教育教学的投入。

不可否认,大学里确实存在有的学生在宿舍违规使用电器等问题,不少学校都曾通过入室检查、收缴违规电器等方式,治理这一问题。暨南大学此次的做法则更进一步,引入类似机场、高铁、地铁等公共场所的安检措施。但是,学校、学生宿舍并不是机场、高铁、地铁,需要“高度防范”。大学不妨把人力物力投入到更该投入的地方,这也是教育管理精细化的应有之义。

学生代表参与的听证会,详细解释学校的考虑,并且确保在流程上保障学生的隐私,减少长时间排队等现象。

宿舍安检之争反映了当代高校管理中的深层次矛盾。一方面,高校肩负着对学生生命安全的责任,任何一起安全事故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;另一方面,高校培养学生的目标包括独立人格和自主精神,过度管理可能与此目标背道而驰。

从根本上说,安全管理的最佳路径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安全意识,而非单纯依靠外部强制。通过安全教育,让学生真正理解安全规章的重要性,从而自觉遵守,这远比被动检查更为有效。只有当每位学生都成为安全管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,校园安全才能得到真正保障。

面对日益复杂的安全管理挑战,高校管理者不妨多些“治未病”的思维,通过完善设施、加强教育、建立机制,从源头上减少安全隐患。

综合新京报、红星新闻、齐鲁晚报等 (业勤 整理)

全县“吐槽大会”的真正看点在于“会后功夫”

□ 徐刚

据媒体报道,近日,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主持召开全县“吐槽大会”。会议以“吐槽”为形式,以“整改”为目的,20家发言单位重点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堵点、痛点、难点,进行限时“吐槽”发言。

在基层政治生态中,专门召开以“吐槽”为主题的会议,无疑是一次积极的形式创新。长久以来,不少地方会议习惯于展示成绩、回避问题,导致一些真实矛盾被掩盖在皆大欢喜的表象之下。霍邱县主动设置“吐槽”环节,让各部门直面问题、畅所欲言,这种直面矛盾的勇气值得肯定。

“吐槽大会”的价值,首先在于构建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对话场域。在限时发言、聚焦问题的规则下,各部门能够跳出日常汇报工作的套路,直接指出工作中的实际困难。更深层次看,这种会议形式的出现,反映了地方治理理念的转变。从强调“成绩单”到主动曝光“问题单”,从追求“表面和谐”到鼓励“建设性批评”,体现的是更务实、更开放的治理思维。

然而,我们 also 需清醒认识到,“吐槽大会”能否真正推动问题解决,关键在于“会后功夫”。历史经验表明,许多创新形式在初期轰轰烈烈,最终却可能流于“口头上重视、行动上忽视”的

窠臼。会场上吐槽的问题,是否能在会场外得到实质性解决?吐槽之后的责任落实、跟踪督办、效果评估机制是否健全?这些后续环节往往决定了一项创新能否从“会议景观”转化为“治理实效”。

从宣传角度看,“吐槽大会”这一称谓本身具有亲和力与传播力,易于引发公众关注。但也要警惕其可能带来的形式化风险。当“吐槽”成为另一种形式的“表演”,当尖锐批评被精心包装为不痛不痒的建议,那么这种创新就可能偏离初衷。真正健康的批评氛围,应当植根于日常工作机制,而非依赖特殊的会议形式。

“吐槽大会”不应止于内部批评与自我批评,更应拓展为连接群众关切的渠道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堵点、痛点、难点,人民群众感受最为直接、最为深刻。如何将体制内的“吐槽”与群众的诉求表达有机结合,形成内外联动的治理改进机制,或许是这一创新形式可以深化的方向。

基层治理现代化不需要高深的理论包装,关键在于能否直面真实问题。当更多地方敢于撕下“政绩面膜”,当问题意识真正成为治理基因,中国基层治理必将迎来更富活力的新篇章。而这一切,都有赖于制度保障下的持续实践与不断深化。

家长成“打印员”,折射家校边界与政策执行症结

□ 曲征

尽管教育部门三令五申要求减轻中小学生学习课业负担,并多次开展专项整治,但仍有一些地方的中小学“明减暗不减”,频繁将“成页不成册”的电子作业或试卷照片发到微信群让家长打印,多的时候一晚上得打印几十页,令人抓狂。这一操作不仅导致学生减负难,家长下班后也疲于看群,生怕一时疏忽耽误孩子作业进度。

“一上小学就买打印机,8天假期打印60张作业”,微信作业打印潮让家长沦为“后勤专员”,这不仅是教育减负的失守,更折射出数字时代家校边界模糊与政策执行僵化的深层症结。

家校边界的隐形错位,是问题的直接病灶。教育部门明令禁止手机布置作业,却异化为“微信发图、家长打印”的变相转嫁。家长的精力消耗远超经济成本,紧盯群消息、抢修打印机、奔波打印店成为日常,甚至探亲都要携机随行。这种“校内责任家庭化”的倾向,违背了“双减”减负学生、松绑家长的初衷,更模糊了学校教书育人的核心职责。

政策执行的“一刀切”则是根源所在。“一科一辅”政策本为规范教辅乱象,却在部分地区异化为机械教条。目录制定调研不足、动态调整缺失,导致教辅无法适配学情变化。比如,

初三需切换教辅类型却无法补订,而教师多本教辅则被指违规,倒逼其拍图打印。

破局之道在于构建“柔性政策+责任归位”的治理体系。其一,建立“动态化”教辅管理机制。“一科一辅”不应是“一劳永逸”的目录,而是要根据学段、学期、学情动态调整。可定期征求教师意见,删除老旧题型、补充分层材料,让目录教辅真正匹配教学需求。同时,为学校预留“自主补充额度”,允许教师根据班级情况采购或印制少量辅助材料。

其二,明确“权责对等”的家校边界。学校需承担起教学物料准备的主体责任,将校本作业打印纳入日常教学保障,简化审批流程;教育部门则应升级监管手段,让隐蔽的违规作业无处遁形。家长的角色是“教育参与者”而非“教学执行者”,当学校切实承担起打印、分发责任,“打印机焦虑”自然迎刃而解。

“背着打印机回老家”的荒诞困局警示我们,教育减负不能止步于“禁止某项行为”,更需打通政策善意与教学实际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唯有让政策更具弹性、责任回归本位,才能让“双减”真正落地为学生的轻装上阵,而非家长的“打印攻坚战”。